



#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从《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人才观

当代史学丛书

● 黄新亚著

221

当代史学丛书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从《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人才观

黄新亚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5插页 124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0046—9/K·8

统一书号：11094·223 定价：1.60元

## 序

就一部小说对一个泱泱大国的民族文化心理影响力深刻久远而言，中外文学史上可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者似不多见；这部作品中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之广、其人物在老百姓中知名度之高，更罕见其匹，所谓“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侈运用之才，动言诸葛。”

《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脍炙人口，自有多方面原因，而这部辉煌的史诗将朝代更迭之际涌现出的各种典型人物的聪明才智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成为中国式智慧的渊薮、古代人才学的百科全书，大约也是其深获民心的缘故之一吧。以往，《三国演义》曾被学者从文学的、史学的等侧面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却似乎很少有人系统探讨《三国演义》在人才学方面提供的丰富内容。然而，近年从报端得知，我们的东邻——日本人极注意从《三国演义》中汲取办事、经商所需要的机智和谋略。据说，《三国演义》及《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典籍成为日本经理人员的必读之书。这个消息使我想起，中国人自己对于《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研究工作，能不能从纯学术的象牙之塔中走

出来，开辟某些应用性课题呢？诸如能不能从智力论、人才学等方面深入挖掘其宝藏，以为今人的实际工作提供借鉴呢？令人高兴的是，现在我们手头上终于有了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从〈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人才观》的书。作者黄新亚同志从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部着眼，对《三国演义》重新加以把握，并由此出发，对中国古代人才观的要旨加以剖析，纵横捭阖，大开大合。书中有中外之比较，有古今之联想；有历史哲学的思考，有人才理论的横议，读来颇觉别开生面。当然，由于全书受规模限制，未能对《三国演义》的人才观作更细致的具体分析，而这种具体分析也许正是读者最感兴趣的所在。不过，对于一部开创性论著而言，这只是白圭之玷，且以新亚的英年博学，日后若有续补之机，不难更进一步。

冯天瑜  
1987年春节于武昌

## 序

本书是《当代史学》丛书之一种。

人类以自己的劳动开辟了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各种智慧的结晶，各种文化的表现形态，各种史剧的演出，都在这条长河中产生，而又构成她的支流，从而使这条长河的水源永不枯竭，使她的面貌日新月异。如果要问：世界上智慧的源泉是什么？我想，最简明的回答是：历史的长河。人类伟大的社会实践产生于历史的长河，而又使得这条长河更加美丽壮观；社会实践都是历史的，没有离开历史的社会实践。所以，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学科都可以归入于大写的“历史”之中。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遗产，从古以来就十分注意历史的记载和历史资料的保存。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悠久的、从未中断的中国历史及其丰富而深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史足以引为自豪的硕果。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以及各个阶段都出现过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以首创的精神对人类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陕西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们的远祖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少威武雄壮的历史剧曾在这里演出。陕西地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对于人类历史长河，特别是其中国历史的伟大业绩，今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真地加以研究、分析和总结，采取实事求是态度，不要有偏见和成见，尽量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这样肯定会使我们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宝贵的历史经验的一些侧面，对近代中国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基本规律，对光辉灿烂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财富，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毫无疑问，这可以振奋我们的精神，开阔我们的视野，坚定我们的信心，鼓舞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伟业。基于这样的需要，我们组织编写出版了《当代史学》丛书。以系列读物的形式，从社会经济、政治、风俗、思想、文化、艺术诸方面去研究史学（偏重于中国历史，但也要探讨世界历史）中亟待探讨的问题。我们十分希望这套丛书能有强烈的时代感，从而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职能，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还希望这套丛书能比较充分地利用陕西地区丰富的文物资源，着重研究周秦汉唐时期的历史和文化。

《当代史学》丛书主要发表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经过认真研究，具有科学价值的作品，热情扶植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

《当代史学》丛书除去强调思想性和学术性外，还要重视知识性和应用性；写作上要求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生动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内容上要有史学知识的介绍，使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能从书中获得应有的知识。

我希望这套丛书问世后，能够为读者同志们所喜爱，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愿意为她写稿，使她成为青年朋友们的良师益友。作为这套丛书的主编，我衷心期待着史学界和读者同志们的热忱指教。

我想强调说明一点：本丛书能够出版，和陕西省政府、陕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 引　　言

写这本书是大胆的，甚至有几分莽撞，因为它的研究范围与思路均与多年来已为人们习惯了的史学体系格格不入。《三国演义》是引人入胜的文学巨著，人才学是密切联系现实的新兴学科，用历史学严肃的面孔、缜密的逻辑思维来联系，也许本身就包含着失败的基因。本书之所以做这样的尝试，考虑到了时代对史学提出的变革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史学观到方法论都不是封闭的僵化体系，它必然要随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历史，是与现在相联系的过去的一切，史学，是以理论形式体现的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它不仅要探讨自然、社会、思维等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而且要展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总体不能离开局部而存在，基本规律只能是各个特殊领域规律的概括和总结，所以，史学不同于哲学、文学、经济学等学科，它既以理论形式，又以具体的历史现象叙述形式，表现对世界的总体认识。正因为总体不等于局部的机械相加，基本规律亦非特殊规律的综合运用，而且，史学工作者的理论思维和对历史现象的叙述，又与

自身的环境、条件、情感、欲望、意志密切相关，所以史学与哲学、文学、经济学诸学科又有很大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结合面，于是，史学具有在总体理论把握下对一切历史现象进行宏观与微观分析的特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历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sup>①</sup>这种以历史学为“唯一的科学”的观点，便是本书的写作动机。

即使跨过了文与史之间的鸿沟，写这本书时还有两座难以逾越的关隘。一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启蒙思想，尤其十四世纪末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中国是否如一般教科书上所指示的那样，正在昏睡？民主、自由是对专制统治而言，中国古代史上有如此强大而野蛮的封建专制制度，那么，作为矛盾的另一方，民主和自由，该有何种表现形式？第二座关隘是人才的规定性，几乎没有谁不承认，一定历史时期有一定的人才标准，那么，各个历史时期均

---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第20页。

用人才来表述这一类人，他们之间，应当有某种共同的内容，使得无论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无论古今中外，都把他们归纳在一起。这个一切人才的共性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慎重的思辨，也需要探索者的勇气。这一道鸿沟、两座关隘使得这本书所要讨论的课题，染上了朦胧的色彩，以致在写作过程中颇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叹。幸而经典作家对这一课题已有触及，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sup>①</sup>提出了人才与改造现实环境之间的必然联系。当代青年学者更对这一课题注入了热情与生力。他们根据经典作家“怎样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地成长”<sup>②</sup>论断而继续探索，提出了“人民性和创造性都是人才概念最基本的内涵。”<sup>③</sup>当代青年学者已指出：人才是人，因而象一切人一样具有社会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人才的社会性又不同于一般人的社会性，人才具有特殊方向的社会性——人民性，所以人才应当是当时社会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3第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第215页。

③雷桢孝《中国人才思想史》引言，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弊病的掘墓人与新的社会生活结构的开拓者，是敢于挺身而出为人民兴利除弊的勇士和先锋。人才区别于一切人的标准在于其创造性，人才的创造性在于并非单纯地熟练地重复前人的创造，而是从实际出发创造新的技术、新的思想、新的人生价值和新的社会生活结构。正是这些闪烁着时代光辉的真知灼见启迪了这本书的构思，力图通过《三国演义》这部家喻户晓的通俗长篇小说，去探讨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1368—1840）时，社会思想的变化，从而把握中国古代人才观的脉搏。

这种与文学、哲学密切相关的史学研究课题，也许应当纳入文化史研究的范畴。由于“旧史皆详于政事而略于文化。”<sup>①</sup>而且，自建国以来，文化史已被分解为思想史、哲学史、学术史、史学史、文学史、科技史等，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作综合性研究的著述反而罕见，此类兼涉文学、哲学、思想、民俗的史学专题作品，更是寥若晨星。1959年英国人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两种文化》的演讲，揭示了当时西方文化已分裂成为互相隔离与误解的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文学家指责科学家卑俗，居然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巨著；科学家反唇相讥，说文学家是色盲，竟对人类智慧最伟大的科

---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90页。

学结晶无动于衷<sup>①</sup>。斯诺是从整个文化的高度提出了问题。文化作为人类知识的财富，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知识领域内不断产生新的科学分枝，本是社会发展的标志，然而狭隘的专业化所带来的知识结构的片面性，必然影响科学家的创造性活动，阻碍他们的探索与成功。由于文化不仅是人类实践与智慧的结晶，而且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创造，所以它不应是一堆现成的、僵死的知识，而应是运用一定知识成果进行再创造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发达，并不取决于它占有的知识总量，而首先取决于它的创造精神。从总体上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文化史的任务。这本书若能被纳入文化史的范畴，那么，用创造的风貌来展示所研究的课题，是笔者的初衷。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在《论各族的风尚与精神》一书中指出历史学的范围不限于政治、军事和宗教，还应当包括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并具体考察了文艺复兴运动在人类历史上的突出贡献。我们的史学研究，当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伏尔泰时代的水平，但继承其创造精神，推进史学研究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仍是必要的。基于以上认识，后学不避寡陋，试作探

---

①见斯诺《两种文化及其再考查》(The Two Cultures and A second loo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讨。在这继往开来时代，本书既期待批评指正，  
更期待共同求索的回响。

## 目 录

序 .....	冯天瑜( 1 )
引言 .....	( 1 )
一、觉醒前的冲动 .....	( 1 )
二、人与人才 .....	( 29 )
三、崇德利用与天人合一——晚周民本思想 的复兴 .....	( 70 )
四、诸葛亮的悲剧 .....	( 101 )
五、自我解脱中的心理平衡 .....	( 138 )
六、协调——人才的坎坷道路 .....	( 187 )
后记 .....	( 220 )

## 一、觉醒前的冲动

§ 1—1 十四世纪后期，地中海沿岸几个欧洲城市里，吹出强劲的飓风；中世纪沉重的夜幕被掀开一角，透进一束照亮人类前进方向的阳光，这就是人们熟知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sup>①</sup>面前，历史与历史学都显示着青春的活力。只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有如此一个自相矛盾之处：我们几乎众口一辞地肯定文艺复兴最早产生于十四至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sup>②</sup>所以，城市的新兴资产阶级为维护和发展其政治、经济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反对教会精神即封建文化的斗争，以新的世界观支配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文艺复兴运动。认为新思想应当是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关系的反映。然而我们的教科书又不能不引用恩格斯的论述：

---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卷3第44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卷一，《马恩全集》卷23第783页。

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sup>①</sup>

但丁1265年生于佛罗伦萨，早在十三世纪内为追念青年时的恋人贝亚特丽丝写了诗集《新生》，把妇女高度理想化，表现了强烈的世俗情感，与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爱情诗歌并无太多区别。但丁的代表作《神曲》是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它产生于但丁反对教皇干涉市政的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流亡期间，但丁1302年流亡直到1321年去世，《神曲》定稿应在十四世纪初期。这样，文艺复兴运动，以及早期人文主义者，似乎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前。

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时间上的自相矛盾，并不是为了否定文艺复兴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只是想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非如 $1+1=2$ 那样明显。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

---

<sup>①</sup>恩格斯《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见《共产党宣言》22页。

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sup>①</sup>因此，在某种经济基础的形成时期，也会出现反映其形成的上层建筑。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当然不是由天而降，它与十一和十二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中世纪城市密切相关。如英国学者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的描述：

欧洲的大多数市镇是独立的或半独立的贵族共和国。大多承认教会、或皇帝、或国王对它有一种含糊的主权。其他有些是某些王国的一部分，甚或是公爵或国王的首府。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内部的自由是以国王的或皇帝的特许状来维持的。在英国泰晤士河上的王城威斯特敏特紧挨着城墙的伦敦市，国王只有得到允许和通过仪式才能进入伦敦。

完全自由的威尼斯共和国统治着一个有许多附属的岛屿和商港的帝国，它多少是按照雅典共和国的方式组成。热那亚也是独立的。

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德意志市镇，从里加到荷兰的米德尔堡、多特蒙德和科隆，在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领导下，松散地结合成一个同盟，即汉萨诸市镇同盟，这个同盟又更加松

---

<sup>①</sup>恩格斯《反杜林论》，《马恩选集》卷3第66页。